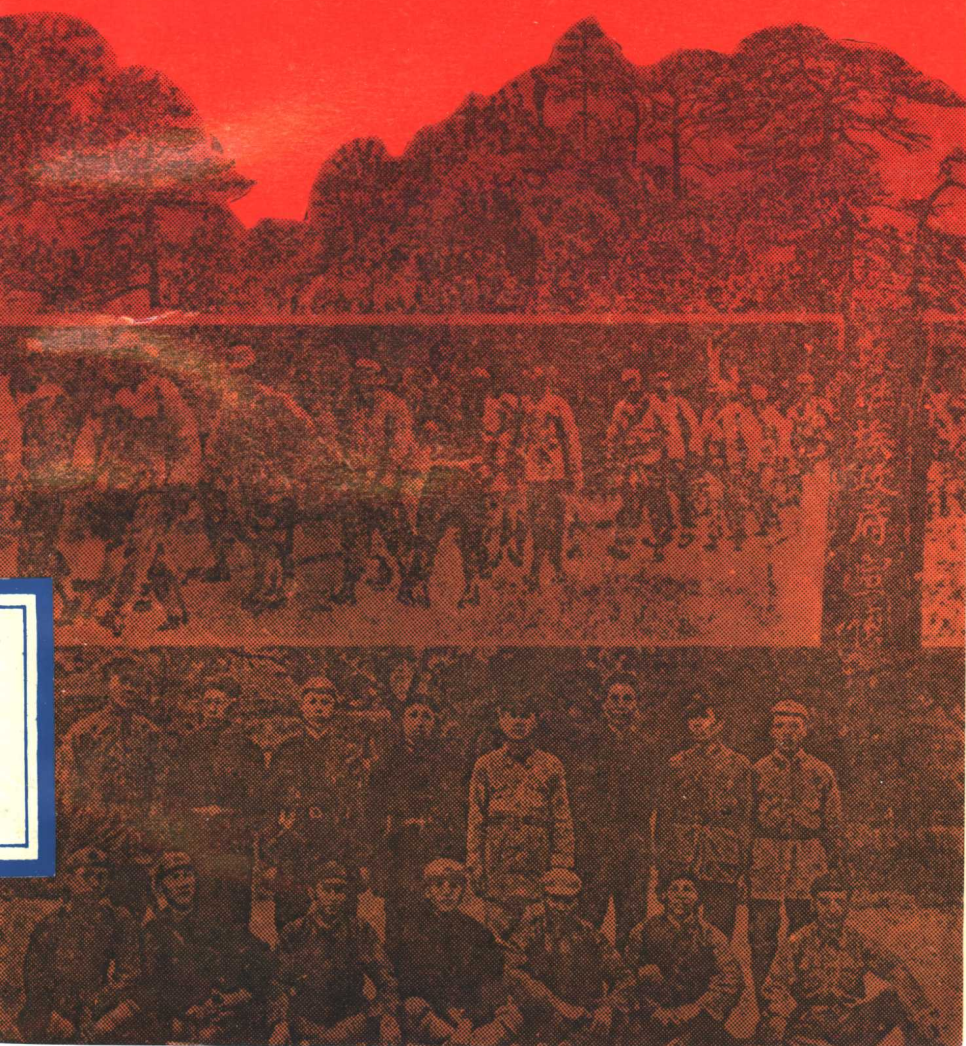


《历史的转折》丛书

主编◎王维礼

独辟蹊径

程书伟·著



《历史的转折》丛书（二）

主 编：王维礼

副主编：舒 闲

独 辟 蹊 径

程舒伟 著

吉 林 人 民 出 版 社

《历史的转折》丛书（二）

独 辟 蹊 径

程舒伟 著

•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长春市全安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5.5印张 120 000字

1993年2月第1版 1993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 200册

I S B N 7—206—01685—5
D·500 定价：全套 27.00元

序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以“一个幽灵，共产主义幽灵，在欧洲徘徊”作为开篇的第一句，表明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势力”震撼着欧洲的大地。在中国，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这个“共产主义幽灵”却又徘徊在中华大地上，为中国人民指明了祖国解放的航向。如果说，70年前，先进的中国人，还只是开始一种可贵的探索，那么，70年后，共产主义却也经历了无数飓风骇浪，艰难险阻，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展现了美好的前程。尽管人们回顾这70年历史时，有骄傲，有慨叹，有经验，也有教训。然而，不管抱有什么目的的人都不能不承认，中华大地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东亚病夫”成为历史，“一盘散沙”已经过去，中华民族跃然崛起，东方巨龙奋起腾飞！

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社会主义发展遭到严重挫折，马克思主义面临严峻的挑战。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能够坚持马克思主义旗帜，坚定不移地领导中国人民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与中国共产党的特点，中国革命的经历，都是有直接关系的。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从事革命活动的，它深深扎根于中国土地之中，一切为了人民。在整个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共产党人始终以中国人民利益为奋斗准绳，从实

际出发，独立地分析世界形势和中国特点，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找到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胜利道路；找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当然，这个过程是曲折的，甚至付出沉重的代价，但其间丰富的历史经验，却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胜利之本。特别是在那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风云变幻，共产党人以坚定的无产阶级信念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探索出通向目的地的航程，驾驭着历史的风帆，克服万千困难，使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这是用血的代价谱写出的胜利凯歌。人们应当认真地学习，汲取这宝贵的精神财富和伟大的精神力量。它对于提高广大人民，特别是广大干部和青年学生的认识水平，增强信心，坚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前进方向，是非常有意义的。基于这个目的，我们编写了《历史的转折》丛书。

《历史的转折》丛书，围绕着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中心思想，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6次重大转折为基本内容，阐明中国共产党人，如何根据中国国情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经过无数艰辛曲折，解决各种复杂矛盾，找到了从新民主主义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变旧中国为新中国的光辉历程。

丛书以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的重大历史转折为主题，分6册，每册一个中心，又相互衔接，反映出中国革命过程中的曲折性、复杂性及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坚定性和创造性。

一、《开天辟地》（1915—1923）

以五四运动为界标，开始了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飞跃。先进的中国人，在探索救国救民的道

路中，经历了从向西方学习转向追求社会主义；从崇尚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历史转折，从而使中国民主革命具有新的特点，使中国革命面貌为之一新，推动了中国人民大革命高潮的到来。

二、《独辟蹊径》（1927—1931）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面对着血腥的白色恐怖，排除万难，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把中国革命的重心从城市转向农村，创造性地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通向胜利的唯一正确道路。在探索新道路过程中，共产党人前赴后继，英勇直前，百折不挠，使革命的星星之火发展到燎原之势，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

三、《生死攸关》（1931—1936）

“左”倾教条主义曾经给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带来严重的危害。1935年的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在革命紧要关头，克服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长达4年的统治，在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使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在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引导下，克服重重困难，一步一步地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迎接抗日高潮的到来。

四、《同仇敌忾》（1936—1945）

从国共10年内战到第二次合作，是从国内战争到一致抗击外敌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伟大转折。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提出与实施，是实现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关键。国民党当局转变政策，接受了第二次合作抗日，实行抗日战争，对国家民族也是有贡献的。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力量，成为中流砥柱。而国共合

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持与发展，是抗日战争胜利的保证。

五、《十字路口》（1945—1949）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面临着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决战。或者是继续维持国民党一党专政的黑暗统治；或者是建立一个独立、富强、民主的新中国。在这严重的历史转折关头，中国共产党为了争取和平，反对内战，进行了极其复杂、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当国民党政府拒绝了人民的善良愿望，点燃起内战战火之后，中国共产党又领导人民革命力量，以自卫战争粉碎了国民党的军事进攻，打垮了国民党的军事防御，在决战中消灭了国民党军事主力，最终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六、《继往开来》（1948—1956）

中国人民经过28年英勇卓绝的斗争，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从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是中国革命的必由之路。1949年，中国开始实施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跨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打退了帝国主义的进攻；完成了土地改革，实现了民主政权的建立和国民经济的恢复。1953年开始，在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引下，奠定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实现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使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确立起来，胜利地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奔向新的航程。

在丛书的编写中，我们几经研讨，在选材、体例和编写方法方面，作了一些探索。我们确定以历史转折为中心，以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及其作用为重点，以基本史实为依据，从具体事件和人物活动入手，力求生动地具体地描述这些波澜壮

阔的历史图画。试图克服一般史书的平铺直叙的平淡，努力使内容重点突出，史实的准确性和情节的具体性、生动性、通俗性相结合，增加可读性。我们希望这种尝试，有助于广大读者对内容的理解，有利于历史知识的普及，更有利于提高广大干部、青年的社会主义觉悟。因此，本书对于高中及大专院校学生、社会青年、广大干部，学习中国革命的历史，增强爱国主义情感，坚定社会主义信念，会有所裨益的。当然，由于学识能力所限，尽管我们的作者都尽了最大的努力，但主观上的设想和编写成果总会有些距离，然而，作为一种开拓，相信会有益处的。不足之处，衷心希望得到批评与指正。

王维孔

1992年春于长春

目 录

序.....	(1)
引言.....	(1)
血雨腥风.....	(3)
倒悬的剑.....	(3)
“盟友”举起了屠刀.....	(9)
水比血浓.....	(13)
周恩来虎口脱险.....	(17)
“国民党只剩下了两个女人”.....	(20)
南昌枪声.....	(28)
小船会议.....	(28)
波澜又起.....	(32)
朱德“请客”.....	(35)
打响第一枪.....	(40)
千里南征.....	(44)
“做失败时的英雄”.....	(50)
湘赣暴动.....	(56)
怡和新房.....	(56)
最先挂了红旗.....	(60)
毛泽东“遇险”.....	(63)
逆境中的抉择.....	(67)
红色山大王.....	(73)

“忠实的共产党人”	(76)
血沃穗城	(82)
张太雷到广州	(82)
聂荣臻的远见卓识	(85)
大安酒米店	(88)
暴动在准备中	(91)
“钦差大臣”的独断	(94)
群雄并起	(98)
方志敏式的道路	(98)
“我要卷土重来”	(103)
渭华风雷	(110)
平江起义	(116)
壮族的“罗宾汉”	(123)
红色割据	(129)
会师宁冈	(129)
大战龙源口	(136)
彭德怀二上井冈山	(140)
八月失败	(144)
布哈林的忧虑	(150)
直下龙岩上杭	(154)
光辉的理论	(158)
红旗漫卷	(159)

引 言

当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了70年之后，伴随着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的炮声，来到了古老的东方——中国。正如毛泽东所说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五四运动中，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革命斗争实践中逐步认识到，要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社会，必须走十月革命的路，建立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曾以宏大的气魄，领导了城市工人运动；并同国民党建立了革命统一战线，推动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但是，由于党还处于幼年时期，党的主要领导人陈独秀不了解中国的新特点，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在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后，使党和革命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血的教训，沉重的代价，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中国革命的重心应当放在农村，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只能从城市之外去寻找。为了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正确的革命道路，从1927年7月起，遍布于中国大地的数百次武装起义爆发了，特别是经过南昌、秋收和广州三大起义的实践，终于找到了一条中国革命唯一正确的道路，即乡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完成了中国

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伟大转折。并使中国革命一步一步走向胜利。

历史过去了，就再也不能重现。但是，过去的历史绝不会无声无息地消逝，它对于我们今天正在进行未来历史的创造而又乐于向过去历史请教的人来说，可以从中得到某种有益的启示。当今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任重道远，回顾中国共产党这一时期的光辉历程，将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血雨腥风

倒悬的剑

广州，岭南重镇，历史名城。虎门销烟，三元里抗英，这里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在这里召开，大会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依据共产国际的决议和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确定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

此后，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苏联政府都为推动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做了大量工作。1924年1月2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高等师范学校礼堂举行，大会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国共两党第一次携手合作推动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黄埔军校建立，工农运动高涨，共产党队伍壮大，广州又成为大革命的摇篮。

此时，中国的北方，硝烟密布，战云滚滚，直、奉军阀又大战于朝阳和山海关等地。正当直奉两军在前线厮杀、相持，北京空虚之时，直系将领冯玉祥倒戈回师，发动了震惊全国的北京政变，囚禁贿选总统曹锟，驱逐废帝溥仪出故宫。在革命形势日益发展的影响下，10月25日，冯玉祥召开政治军事会议，决定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这给解决全国统一问题带来了新的转机 and 希望。

孙中山以民族利益为重，从大局出发，毅然复电冯玉祥

等人，表示拟即北上，与诸兄晤商。

1924年11月，孙中山在宋庆龄、鲍罗廷等陪同下，离穗北上，经上海，绕道日本，12月4日，到达天津。中共天津地委发起成立欢迎孙中山的筹备会议，组织了两万多名群众到码头迎接。月底，孙中山专列到达北京，受到十万各界群众空前盛大的热烈欢迎。

孙中山到北京后，以带病之躯操劳过度，在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进行期间，因患肝癌，于1925年3月12日溘然长逝。他在政治遗嘱中说：“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北京及全国各地都纷纷举行公祭和追悼大会。4月2日，孙中山遗体移往北京香山碧云寺石塔。一颗时代的巨星陨落了。随之，革命阵营和反革命阵营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国共合作的实现，预示着大规模的革命风暴已经来临。风起云涌的工人运动，波澜壮阔的农村大革命，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国民革命的迅猛发展，使陈独秀这位党的重要领导人感到眼花缭乱了。这位新文化运动中的旗帜，五四运动的总司令，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宣传者，却显得积习很深，包袱很重，步履艰难；更可悲的是由于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他将革命领导权拱手相让。巨大的危机潜伏着。

1925年11月，初冬的北京京郊西山东麓，风景如画的香山，已是银峦素裹，分外妖娆。著名的西山晴雪是旧燕京的八景之一。在西山名刹——碧云寺，一伙人正密谈于寺内。与那些笑口常开的弥勒佛相反，这伙人充满了杀机。这就是以邹鲁、谢持等人为首的国民党老右派，在召开所谓的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在国民党一大前，他们曾极力反对国共合

作；现在，孙中山尸骨未寒，他们又在破坏他的未竟事业，公开反对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形成西山会议派。他们在北京设立伪地方党部，公然破坏国共合作，分裂革命阵营与国民革命运动。对此，著名国民党左派领袖宋庆龄深感问题的严重性，曾通电谴责他们说：“总理泉下有知亦当痛哭。”

当西山会议准备召开之际，自诩为国民党理论家的戴季陶欣然前往，并与邹鲁、林森联电汪精卫北上赴会。但当时在北京的老右派冯自由，误闻戴季陶是共产党，便雇了几个流氓绑架了他，对其大打出手。戴一再哭诉是非之地不可久留，他不待开会即返回上海，但声明同意大会决议。

戴成为“反共先锋”也是由来已久。在国民党一大期间，他不赞成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为此和廖仲恺发生激烈争论。在孙中山肝病复发迅速恶化时，戴季陶闻讯赶赴北京，随侍于孙中山病榻左右。据戴自称，孙中山病中，他曾陈述己见，认为三民主义实渊源于中国古代正统思想，请示是否可就体会心得，写成文字问世，以“正人心而端趋向”，孙中山听后“许其尽情倾吐”。戴遂“勇气百倍”，竟改名传贤，以孙中山精神遗产的继承人自居。料理完孙中山的丧事后，戴直奔上海用两个月时间写成《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和《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两本小册子。在前一书中，戴季陶提出，孙中山的思想理论学说，完全来源于中国古代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以至孔孟的忠孝仁义道德思想。后者则强调，欲图中华民国之生存，必先图中国国民党之生存，更须充分发挥为中国国民党生存所必须具备的独占性、排他性和统一性，才能实现各阶级的联合革命。这两本小册子片面夸大了孙中山思想理论的消极成分，否定了三民主义学说

的革命性、战斗性，其实质是排斥中国共产党，争夺统一战线的领导权。

戴季陶的倒行逆施，受到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强烈谴责。苏联顾问鲍罗廷称其为国共合作的一大魔鬼；瞿秋白、李大钊等人写了大量文章，针锋相对地批判了戴的谬论。他自封为孙中山“道统”继承人的做法，也引起了一些国民党元老，包括一些老右派的不满，有人气愤地说，总理生前既没有收他做门生，他也从没有拜总理做先生的一回事，僭称受业，不仅欺人，也欺总理在天之灵。

戴季陶主义成为国民党新、老右派的理论基础，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公开引用戴季陶的反共理论，戴季陶的意图最终被蒋介石实现。

1926年3月的中山舰事件是蒋介石为代表的新右派实行反共的一个重要步骤。

通过两次东征和讨伐杨、刘等战役的胜利，蒋介石逐步成为广东革命政府军事方面举足轻重的人物。他的起家本钱是由国共合作建立起来的黄埔军官学校。因此，在一段时间内，他表面上同共产党合作，表示赞成革命。实际上在随时提防和限制共产党，是右派势力的保护者和组织者。随着他的实力逐渐增长，反共面目越来越明显。1925年11月在东征途中，他召集连以上的军政人员联席会，公开表示他的黄埔军校不可分裂，要求把所有的在黄埔军校以及在军队中的共产党员的名字都告诉他，所有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的名字也要告诉他。当时周恩来以此事关系两党，须请示中共中央才能决定，搪塞过去了。

从1926年1月到3月间，蒋介石在暗中积极准备“三·二〇”事件。他一会说自己心神不定，“如不猛策，失败即

在目前”，一会又对张静江说，莽莽前途，不知此生成败如何？一会又说“处境厄厄”，要“积极进行，冲破难关”，看来是话中有话。其实，他是暗中准备反共，又感到成败难卜，所以说出以上令人费解的隐语来。最后终于决定“贯彻初衷”，这也有成竹在胸了。

事件发生前，蒋的亲信到处散布谣言，说“共产党要暴动，推翻国民政府，组织工农政府”，“共产党准备倒蒋，正在黄埔军校查帐，说蒋介石有贪污”，以惑乱人心，煽动反共，经充分准备后于3月20日这天，蒋介石散布谣言，说中山舰要炮轰黄埔军校，共产党人要把他赶走。以此为借口，突然翻脸，逮捕了代理海军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下令黄埔戒严，监视各师党代表，包围苏联领事馆和省港罢工委员会，监视苏联顾问，解除了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周恩来闻讯后，立即赶到扣押共产党员的广州卫戍司令部，质问蒋介石，也被软禁一天。

当时，蒋介石提出两个条件：共产党员退出第一军，不退出的要交名单。对此毛泽东、周恩来等主张给予反击。从当时革命力量上看，制止蒋介石阴谋得逞是有可能的。驻扎广州的国民革命军6个军中，除第1军被蒋掌握一部分外，其余各军都与蒋介石有矛盾。但毛泽东等人的主张被陈独秀所拒绝，在广州的苏联顾问季山嘉也不赞成反击。陈独秀错误地认为“中山舰事件”发生，是因为共产党员“包办”了国民党的工作和蒋介石误信了“谣言”。他派张国焘到广州处理此案，张国焘同刚从苏联回到广州的鲍罗廷一起采取妥协政策，接受了蒋介石的条件。于是，已暴露身份的250多名共产党员被迫退出国民革命军第1军和黄埔军校。陈延年因为这件事，气得大骂他的父亲陈独秀是“老糊